

# “共同体”与“文明等级”： 阿尔弗雷德·齐默恩的国际政治思想

王紫珠

**内容提要** 阿尔弗雷德·齐默恩是英国国际关系学科的首任讲席教授,其发源于两次世界大战间期的国际政治思想对学科的理论 and 身份认同的构建起着关键作用。“共同体”是齐默恩国际政治思想的核心,其形成既基于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和对国联的设想,也融入了一种“古今类比”的认识论。齐默恩倾向把古希腊政治制度类比到所处的时代,体现了他对深受重商主义、个体主义影响的现代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反思。然而,他同时在“共同体”中纳入一种基于文明的等级制观念,并体现在对国联的政策建议中。总之,齐默恩的国际政治思想内容丰富和多样,并非学界一贯认为的“理想主义”所能涵盖。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国际政治思想史 英国 阿尔弗雷德·齐默恩 “共同体” “文明等级” 国际联盟

---

\* 王紫珠: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全球研究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候选人。

\*\* 本文得到“2021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CSC)”资助(项目编号:202106100030)。感谢复旦大学陈玉聃副教授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1918年,欧洲结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翌年,在英国的威尔士大学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治学讲席——伍德罗·威尔逊讲席,这宣告了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时年40岁的牛津大学前任古代史讲师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n, 1879-1957)成为首任讲席教授。1931年,齐默恩转至母校牛津大学担任首任蒙塔古·伯顿(Montague Burton)讲席教授,讲授国际关系学。<sup>①</sup>齐默恩不仅是国际政治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英国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他曾任英国外交部雇员、《国际联盟盟约》起草者、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副主任、<sup>②</sup>英国“圆桌运动”和犹太复国运动的重要参与者等。<sup>③</sup>齐默恩的学术生涯横跨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他的主要思想体现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期<sup>④</sup>所形成的国际政治思想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的人生境况遇到转折,并成功登上国际舞台。可以说,他对国际政治学科的奠基和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赫德利·布尔等学者在著述中都曾提及他;<sup>⑤</sup>作为齐默恩的前学生及同事,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宣称齐默恩是影响其思想和一生的杰出学者之一。<sup>⑥</sup>

时至今日,国际关系学科已走过百年诞辰。但相较于其他同时期的国际政治学者,齐默恩研究在西方主流学科语境中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国内学

---

① 关于齐默恩的履历,参见D. J. Markwell, "Zimmern, Sir Alfred Eckhard," in H. C. G. Matthew and Brian Harrison, eds.,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6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993-995.

② 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ICIC):由国际联盟于1922年成立,致力于通过国际知识合作推进和平进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身。齐默恩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委员会首位执行秘书。See John Toye and Richard Toye, "One World, Two Cultures? Alfred Zimmern, Julian Huxley an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UNESCO," *History*, Vol.95, No.3, 2010.

③ “圆桌运动”(the Round Table Movement)是指1909年由部分英国社会运动者和知识分子所创立的以统合英帝国联邦、推动帝国改革为目标的社会集团,相关研究参见石峰可:《一战前后英国的“圆桌”集团及其争取帝国联邦的努力》,《理论界》2018年第2期。

④ 两次世界大战间期(the interwar period)特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历史时期,主要涵盖20世纪20至30年代。

⑤ 卡尔曾在《二十年危机》中多次引用齐默恩的言论,参见E.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Reissued with New Introduc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关于摩根索的引用,参见Hans Morgenthau and Kenneth Thompson, ed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lected Reading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2, p. 18;关于布尔的引用,参见Hedley Bull, "What Is the Commonwealth?" *World Politics*, Vol.11, No.4, 1959.

⑥ 详见汤因比的自传:Arnold Toynbee, *Acquaintan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49-61; "Obituary," Last modified May 24, 2018, <https://www.geni.com/people/Alfred-Eckhard-Zimmern/6000000013530733233>, 2023-09-13.

界提及齐默恩的大多限于一些理论教材或历史评述性文章,并与伍德罗·威尔逊相提并论,<sup>①</sup>或直接称其为“自由主义理论学者”。<sup>②</sup>究其原因,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无关联。介于齐默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国联、国际合作给予厚望,学界普遍将其视为“理想主义”流派的代表人,其1936年出版的代表作《国联与法治》(*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Rule of Law, 1918-1935*)<sup>③</sup>被布尔称为“‘理想主义’学者最精炼的作品”。<sup>④</sup>理想主义通常作为现实主义的对立面出现,包括一系列以追求和平、信仰道德、进步和规范性学说等为特征的国际思潮。<sup>⑤</sup>随着国联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理想主义逐步丧失了理论上的可信度,并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次论战”中被古典现实主义“缺席审判”,自此逐步淡出理论研究者的视野。

自20世纪80年代起,面对风云诡谲的国际局势,一些理论学者开始重新研究两次世界大战间期的国际政治思想,以期对当时的国际局势提供应对策略。为此,齐默恩又重回学界视野。在纷繁复杂的思想来源的影响下,将齐默恩的国际政治思想简单视作“理想主义”是否恰当;所谓“理想主义者”的齐默恩是否只是枉顾现实、盲目乐观地支持国际联盟与国际合作;其政治主张的根源为何,体现了何种特定的政治立场,又对国际关系学科乃至后世的国际实践造成了何种影响?这些都成为了当代学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本文将齐默恩最为核心的“共同体”(Commonwealth)思想作为切入点,揭示其形成脉络,并结合20世纪初至两次世界大战间期的历史变革这一时代背景,分析齐默恩如何将该思想融入国际联盟的建构中,构建出一种基于文明标准的等级制国际秩序,继而指出这种思想如何对当下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不俗的影响力。本文旨在探求齐默恩思想与其古典学研究(Classical Studies)经历的紧密互动,以揭示其国际政治思想中的“古今类比”认识论偏好:齐默恩作为古典学专业出身的研究者,对古希腊历史与政治情有独钟,在其国际政治思

① 代表性教材参见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二章;白云真、李开盛:《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二章第三节。

② 王黎、吴苏北:《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的历史学家及其贡献》,《世界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8辑,第278页。

③ 中国学者还将其译作《国联与法权》,参见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43页。考虑到英语原意和该书主要内容,笔者倾向于译作《国联与法治》。

④ [澳]布尔:《1919—1969年的国际关系》,载[美]詹姆斯·德·代元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秦治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

⑤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21页。

想中经常能看到他将古代与现代政治相互影射。这种古今类比是理解齐默恩国际政治思想的一把尤为重要的钥匙,也是后人解读齐默恩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语境。

## 一、学界对齐默恩的研究

当代西方学界对齐默恩国际政治思想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大致分为两派。其中,第一派学者仍倾向于将齐默恩置于现实主义对阵理想主义的大语境下,旨在对其政策主张的贡献和局限性进行评述。这批研究始于1986年,时任牛津大学研究员的唐纳德·约翰·马克韦尔(Donald John Markwell)撰文,在《国联与法治》出版50年对齐默恩思想进行回顾。他重点梳理了该书中国绕国际合作、国联改革、反战等方面提出的方针,并从五个理论维度入手分析了齐默恩的得失:对进步的信仰、对利益和谐的支持、对法治的理解、对国际社会的依赖和对国际失序的补救措施。<sup>①</sup>他总结到,齐默恩的上述主张仍可在先前或同时期的学者的著作中找到,因此是缺乏深刻性和原创性的。不过,他极富思辨精神的思想也成为后来国际政治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基石。<sup>②</sup>该文的观点仍与冷战初期“第一次论战”的主基调相差不多,文中论及的除齐默恩对国联的主张外,并未涉及其丰富的思想来源、社会活动、思想的前后转变等。

时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批判理论的发展,一些学者尝试突破“现实主义对阵理想主义”这一刻板划分,通过细致考察齐默恩所生活年代的具体、真实、细节的历史环境来重新评价其思想主张。《20年危机中的思想家:战间期理想主义重访》一书就有涉及对齐默恩思想的详细论述和评价。该书针对十位后世被视为“理想主义”的战间期知识分子进行了重访,<sup>③</sup>其中,时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研究员保罗·里奇(Paul Rich)撰写了齐默恩的章节,简要剖析了他的国际教育、国际主义和“共同体”等主张——这些方面是马克韦尔时代那些

---

<sup>①</sup> D. J. Markwell, "Sir Alfred Zimmern Revisited: Fifty Years 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2, No.4, 1986, pp. 279-292.

<sup>②</sup> *Ibid.*, p. 290.

<sup>③</sup> David Long and Peter Wilson, eds., *Thinkers of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Inter-war Idealism Re-assessed*, Clarendon Press, 1995, pp. 3-4.

刻意关注“高政治”的学者所未能关注到的。并且里奇提出，齐默恩并非没有意识到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政治因素，因此里奇将他称为“审慎的理想主义者”（Cautious Idealist）。<sup>①</sup>《20年危机中的思想家》促使学界开始对扣在齐默恩等人头上的“理想主义”帽子进行反思，即“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的二分法并非恰当。<sup>②</sup>

总的来说，第一派齐默恩研究者虽试图客观地回顾齐默恩的主张，但仍被传统学科视角所束缚，倾向于对进行全面的理论概括，而非细致的历史考据。但在回顾的过程中，学者逐步发现了上述视角的弊端，开始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在这一过程中，新的议题领域正不断涌现——正以此为契机，第二派研究才得以开启。

第二派齐默恩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末不断持续至今，学者开始摒弃“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二分法，尝试跳出国联、国际合作、国际教育等具体议题领域的分割和束缚，使用语境主义、观念史、谱系学等研究方法对齐默恩思想进行多方面、多维度的讨论，意在揭示其思想和更宏大的国际政治思想的脉络关系，并以齐默恩为立足点，完善国际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谱系。因此，学界关于齐默恩思想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首先，一些学者指出了齐默恩与“观念论”（Idealism）这一哲学流派的紧密联系，这与对“观念论”一词的考察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和“理想主义”一词拥有相同的英文称谓；然而，正因为没有细致区分哲学观念论（philosophical idealism）和政治理想主义（political idealism），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理论家才对所谓的“理想主义者”做出了错误的批判。<sup>③</sup>由此入手，里奇指出了德国观念论（German Idealism）对于齐默恩的影响，这一哲学流派的发源正是知名哲学家黑格尔的学说。黑格尔哲学风靡爱德华时期的英国，塑造了齐默恩在牛津大

---

<sup>①</sup> See Paul Rich, “Alfred Zimmern’s Cautious Idealism: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Commonwealth,” in David Long and Peter Wilson, ed., *Thinkers of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Inter-war Idealism Reassessed*.

<sup>②</sup> Cameron G. Thies, “Progress,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Case of the Idealist-Realist Debat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8, No.2, 2002, p. 173.

<sup>③</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家通常将卡尔的《20年危机》视作对“理想主义”进行批判的奠基作品。然而，纵观此书，卡尔仅使用了三次“idealism”，且目的是批判乌托邦主义者太过信仰观念论哲学而导致他们忽视现实，并非指代后世学者所谓的政治“理想主义”。参见 Peter Wilson, “Introduction,” in David Long and Peter Wilson, eds., *Thinkers of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Inter-war Idealism Reassessed*, pp. 3, 21 (endnote 4)。

学接受的早期高等教育。彼时,社会科学还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般得到科学化和体系化的发展,观念论的流行使齐默恩更倾向于相信一种道德形而上学的社会进化观念。<sup>①</sup>可见,齐默恩是与政治理论中的重要流派紧密联系的,而非马克韦尔所说的“缺乏深刻性”。而牛津大学副教授珍妮·莫尔菲尔德(Jeanne Morefield)进一步挑战了上述观点:与其说是德国观念论,不如说是英国观念论(British Idealism)这一本土思想对齐默恩造成了更大影响。她指出,齐默恩在19世纪末于牛津求学之际便受到该校政治哲学家、英国观念论和新自由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和其同事的耳濡目染。<sup>②</sup>也因如此,齐默恩常被后人误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然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政治思想在历史长河中拥有着诸多不同的分支,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有着明显区别。莫尔菲尔德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耳闻目睹德国的战争行径,牛津知识界开始反思和扬弃黑格尔主义和德国观念论;相比之下,对英国本土思想的支持则日益高涨。<sup>③</sup>这塑造了齐默恩在国际舞台上支持国家间的政治文化合作、反对一味鼓吹商业合作的政策取向。

此外,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马路智仁(Baji Tomohito)认为,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齐默恩。齐默恩所参与的“圆桌运动”致力于提升英联邦内部的凝聚力,即加强英国本土与各自治领、殖民地间的关系;而伯克的政治思想能够为其提供智力支持,齐默恩试图将伯克关于公民道德的学说应用到英联邦的整合中,使其基础建立在个体间的道德团结之上,而非消极地被主权所束缚。<sup>④</sup>不过,马路智仁也指出,在某种程度上,伯克的思想只是被齐默恩拿来掩饰他对延长英帝国殖民统治的支持。<sup>⑤</sup>但囿于当时国际政治研究的重镇多位于英美等国,帝国思想的渗透痕迹大多被悄无声息地抹去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齐默恩的帝国取向仍未被理论家所

<sup>①</sup> Paul Rich, "Reinventing Peace: David Davies, Alfred Zimmern and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Interwar Brita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6, No.1, 2002, p. 121.

<sup>②</sup> Jeanne Morefield, *Covenants without Swords: Idealist Liberalism and the Spirit of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0.

<sup>③</sup> Ibid., pp. 55-57.

<sup>④</sup> Tomohito Baji,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as Liberal International Avatar: with the Spines of Burk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Vol.46, No.5, 2020, pp. 3-4.

<sup>⑤</sup> Ibid., p. 2.

谈及。

除上述英国本土政治思想外，作为德裔犹太人，齐默恩的思想还体现出犹太教的影响。马路智仁指出，少数族裔的独特身份认同促使齐默恩在政治实践中通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找寻国际合作的途径。在此过程中，他尽力抹平“种族”的区别，以“国家”取而代之。这体现了他对当时普遍存在于国际体系中的种族主义倾向的反对，以及对不同国家在跨文化环境中共存的希冀。马路智仁因此将其学说称之为“国际关系学科中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研究的起源”。<sup>①</sup>然而，这种观念又与上述观点体现出的帝国思想并行不悖，构成了齐默恩思想中的一股内部张力。

最后，在齐默恩涉足国际政治领域前，他还有一段重要经历未被充分挖掘，即他学习和从事古典学研究和教学的这一时期。学界普遍关注齐默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涉足政坛的表现，却往往倾向忽视古典学对塑造其认知的重要作用。剑桥大学研究员米勒特(Paul Millet)谈及，这种影响贯穿了齐默恩政治思想的始终。在牛津大学工作期间，齐默恩结识了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 1866-1957)等爱好古典学的同事，且在其国际政治专著、文章、演讲中多次提及古希腊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并与当下的权力政治现状相对比。<sup>②</sup>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者从古典学入手，分析齐默恩如何将古代政治状况与现代相类比，并与国联的构建和英联邦的整合相联系。<sup>③</sup>这无疑将齐默恩研究提升到了新高度：其思想不仅受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和思潮的直接影响，还与“伟大的存在之链”相连，在古代和现代之间的时间鸿沟上架设了桥梁。<sup>④</sup>这表明，历史中的国际政治思想确会对

---

<sup>①</sup> Tomohito Baji, "Zionist Internationalism? Alfred Zimmern's Post-racial Commonwealth,"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Vol.13, No.3, 2016, pp. 624, 651.

<sup>②</sup> See Paul Millett, "Alfred Zimmern's The Greek Commonwealth Revisited," in Christopher Stray, ed., *Oxford Class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1800-2000*, Duckworth, 2007, pp. 168, 180.

<sup>③</sup> See Mark Mazower, *No Enchanted Palace: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Jeanne Morefield, *Empires without Imperialism: Anglo-American Decline and the Politics of Defle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日]马路智仁:《“因此他们献身共同体”：阿尔弗雷德·齐默恩的〈希腊共和国〉和帝国共和主义》，王紫珠译，《复旦政治哲学评论》2021年第13辑；Tomohito Baji, *The International Thought of Alfred Zimmern: Classicism, Zionism and the Shadow of Commonwealth*,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sup>④</sup> See Paul Millett, "Alfred Zimmern's The Greek Commonwealth Revisited," p. 180.

今日的国际实践产生长远的影响。但遗憾的是,正如马路智仁所言,既有文献往往倾向于关注齐默恩的国际政治学专著,对其古典学著作的分析则是较少的。<sup>①</sup>

综上,第二派研究中的四种观点通过对齐默恩所处的历史语境和其著作、手稿、书信等文本的解读,剖析了其在国际政治思想史谱系中的所处位置,同时也了解到“共同体”在齐默恩思想中的重要地位。<sup>②</sup>在早先的研究中,里奇等学者通过剖析齐默恩对国际合作、国际教育的态度,引出了他对在国际层面建构“共同体”的契机;而较新研究进一步通过将其共同体思想与构建“英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活动(如“圆桌运动”等)联系起来,构成了对齐默恩更凸显时代特色、独具历史价值的描摹。从政治哲学渊源上看,“共同体”这一英语词汇也可译作“国家”(commonwealth),其理论阐述早可上溯至霍布斯的国家理论;而在20世纪初期,齐默恩通过一系列实践活动,试图将这种根植于英国本土的政治思想应用于国际层面。这在当时是具有挑战性的,在当下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齐默恩的“共同体”思想进行研究既有助于在更宏大的思想史背景中寻找关于国际合作、战争与和平的重要线索,也可观测战间期国际政治思想对塑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乃至当代国际格局的直接或间接作用。

从方法上看,也可看出第二派研究较之于“二分法”“大论战”等传统叙事有所突破。但传统叙事对塑造学科的自我认同仍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齐

---

① [日]马路智仁:《“因此他们献身共同体”:阿尔弗雷德·齐默恩的〈希腊共和国〉和帝国共和主义》,第396页。

② “commonwealth”这一英语词汇有多重含义及中文译法,如共同体、共和国、联邦(特指英联邦)等。国内现已将齐默恩的 *The Greek Commonwealth* (1911)一书译成中文,将“commonwealth”译为“共和国”,参见[英]阿尔弗雷德·E.齐默恩:《希腊共和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龚萍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关于这一译法,笔者借用马路智仁的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齐默恩对古希腊进行研究的这一时期,他受到了19世纪以来的“国家有机体”理论的影响,故将“commonwealth”视作一种有助于提升英联邦内部凝聚力的理想政体类型,即对于“国家”(the State)这一政体的改良,参见[日]马路智仁:《“因此他们献身共同体”:阿尔弗雷德·齐默恩的〈希腊共和国〉和帝国共和主义》。笔者赞成此观点,故保留这一书名的译法。然而,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语境和该时期齐默恩欲阐释的核心思想,笔者选用“共同体”作为本文研究中的“Commonwealth”(以大写首字母做出区分)的翻译,以彰显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思想特色。

默恩作为“理想主义者”仍被写入教科书和理论著作并代代相传。<sup>①</sup> 在此标签之下对齐默恩思想进行研究仍会不断产生将当代思维方式生硬地套在古人思想上的时空错置(anachronism)问题,阻碍理论的进步。为此,笔者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是利用基于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思想史研究范式和强调一手文献的史学研究方法对齐默恩思想进行重访。如今,在“历史学转向”的引领下,史学方法在建构国际政治理论方面愈发成为显学。<sup>②</sup> 史学的技艺不仅可以给国际政治研究提供史料支持,也能赋予研究问题以厚度,使研究者认识到事件的复杂性与多维的时间意涵,避免简单化地看问题。<sup>③</sup> 因此,本文借助语境主义,通过一、二手史料互证的研究方法,主要选取齐默恩自1911年至1936年间出版的专著、译文、讲稿等一手文献,侧重对齐默恩著作中尚未被学界充分挖掘的古典学线索进行细致剖析。

## 二、现代社会中的古典反思

在详细阐释齐默恩的“共同体”思想前,有必要对其所处时代的三个重要知识背景进行简要梳理。其一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在齐默恩看来,自由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固然带来了繁荣的贸易和便利的生活设施,但也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削弱了彼此间的纽带,那种似古希腊人般的政治团结变得无处可寻,国际社会的根基更是难以建构。例如,齐默恩曾参与过的“圆桌运动”的纲领性文件《绿色备忘录》指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物质主义和商业精神在民间蔓延侵蚀了英国人的道德和精神气质:“悲观主义遍布英格兰……城市里的人们不仅在卫生方面,甚至在气质方面都经历着肉眼可见的衰落。”<sup>④</sup>齐默恩也曾描写到:相

---

① 近年,在学界尤有影响力的学者仍在重复此类观点。例如,米尔斯海默在《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中就将齐默恩视作“自由理想主义”中的一员,并认为该学派有追求“道德良善”和“人的道德进步”等主张;但米氏同时也提及“它(自由理想主义)的创始人是托马斯·希尔·格林”,且与“黑格尔(学说)”紧密联系。可见,米氏仍未对“idealism”的政治含义和哲学含义进行清晰地区分,因此,对齐默恩的评价颇为片面。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12,94—100页。

② 秦治来:《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转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

③ 任晓:《大历史的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4期,第37—38页。

④ *The Green Memorandum*, Lionel Curtis Papers, 156/4,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pp. 21-22.

比于古代人,“匆忙、混乱、了无生气的现代生活方式将人类隔绝于一幢幢盒子似的城郊别墅中,人们不是太过自负就是太过腴腆……甚至连为故去的邻人拉下窗帘致哀这种最普遍的人性都无暇顾及。”<sup>①</sup>因此,在对现代工业文明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齐默恩试图借古希腊人文精神唤起公众对于德性和公共意识的追求,这也是他倾向于用古今类比的视角阐释当代国际政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成为新型战争的导火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知识分子普遍意识到世界大战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源于列强在瓜分殖民地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并且这种战争形式与欧洲过去的战争截然不同。首先,从战争的根源上看,19世纪前的战争“或是宗教的,或是王朝的,或是经济的,抑或是感情用事的”;然而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驱使着欧洲大国在全球范围进行扩张、开拓市场,强迫其他国家与其进行贸易,成为了战争爆发的导火索。<sup>②</sup>此外,在现代国家中,战争的形式也不仅局限于军事实力的对抗,而是进一步演变成为总体战,投资者、实业家、民众情绪等各种主体与一国的内政外交复杂地交织在一起,<sup>③</sup>帝国俨然成为一个新型的庞大利维坦。因此,齐默恩也对商业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进行了反思,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仍不断鼓吹“贸易和平论”的知识分子表现出反感,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然而这点极易被当代国际关系学者忽视,齐默恩和同时期诸多欧洲知识分子的主张倾向于被主流国际关系学界统归为“自由国际主义”,<sup>④</sup>民主和平论、贸易和平论、对国际制度、国际法和国际合作的支持等国际实践都可囊括其中。<sup>⑤</sup>这种论调也一定程度影响了齐默恩在学界的身份定位,他因此常被归类为自由主义理论家。

---

① Alfred Zimmern, *The Greek Commonwealth: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 Clarendon Press, 1911, p. 90. 引自本书的内容均为笔者由英语版翻译而来,并部分参考了中译本的译法。

② Leonard Woolf, *Empire and Commerce in Africa: A Study of Economic Imperialism*,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20, pp. 22-23.

③ Ibid., pp. 315-318.

④ See David Long, “J. A. Hobson and Id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7, No.3, 1991, p. 286; [英]彼得·威尔逊:《关于“第一次大争论”的神话》,载[英]提莫·邓恩编:《八十年危机:1919—1999年的国际关系》,第24页; Vitor Ramon Fernandes, “Idealism and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Ontological Debate,” *Janus Net 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7, No.2, 2016, p. 15.

⑤ Beate Jahn,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Theory, History, Practic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13-15.

第三个知识背景是指对英国作为“文明国家”的崇拜，这使齐默恩的古典情节与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观念深深纠缠在一起。如上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如何处理列强与殖民地以及列强间的矛盾成为欧洲政治家探讨的核心问题。战争结束后，欧洲人民夹道欢迎伍德罗·威尔逊和他的《十四点计划》，认为他带来了和平的曙光。可以看出，欧洲的政治领导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普遍确信发动战争既违背了国际法，也会使自己名声扫地。<sup>①</sup>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希望停止帝国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以“战争”作为表象的帝国思想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基于文明优越感和道德责任感的帝国思想却并未消退。这在英国思想界表现得尤为突出：经历了维多利亚时期的鼎盛之后，20世纪初的英国仍是世界霸主，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和众多海外殖民地，“教化的使命”渗透进帝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塑造了他们所栖居的特定的世界”。<sup>②</sup>身处“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齐默恩的国际政治思想也终究难逃这一时代局限：他虽然提倡唤起民众心中的道德观念，由此构筑一个和平的国际体系，但也不否认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差别，而走在前面的国家有义务引领后来者走向文明。

总而言之，齐默恩的国际政治思想与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特殊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齐默恩的“共同体”思想如何脱胎于古典学研究，如何受到同时代思潮的影响，并如何被应用于构想国际政治、塑造何种国际实践？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时，即使需时常付诸对古希腊政治的考察，也不能将其思想完全从历史背景中剥离开。

### 三、从古希腊城邦到现代国家：“共同体”的形成

“共同体”观念是齐默恩国际政治思想的凝练表达，无论在他对国联和国际教育的政策主张中，还是在国际政治专业的教学中，均能发现这一思想的底色。这并不仅是他通过观察与体会当下国际局势而得出的思考，还源于他将古希腊时期的政治现状投影到现代国家和国际关系中这样一种独特的认

---

<sup>①</sup> [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缔造和平：1919巴黎和会及其开启的战后世界》，邓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8、21—22页。

<sup>②</sup> Luke Reader, “‘Not Yet Able to Stand by Themselves’: Leonard Woolf, Socialist Imperialism, and Discourses of Race, 1925-1941,” *Trans-Scripts*, Vol.1, 2011, p. 105.

识论。

齐默恩曾在牛津大学先后教授古代史和国际政治等专业课程。1911年,他的处女作《希腊共和国: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以下简称《希腊共和国》)问世。在这部代表作中,齐默恩典雅的笔触体现出与同时代其他古典学者不同的特色:他倾向于把古希腊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事例类比到当今的时代语境中(反之亦然),并借此暗含其政治偏好:呼吁公民基于共同的道德基础来凝聚共识、投身公共生活之中。这种古今类比在政治思想界并非罕见:前有马基雅维利,后有列奥·施特劳斯等。对古典的借鉴必然基于对当代的深刻反思。面对上文所提到的智识危机和现实瓶颈,这些思想家倾向从古典思想中寻求答案,因为古代思想中蕴藏着现代人难以触及的智慧——被古典哲学视作认知根本目的的东西,却往往成为现代科学的盲区,<sup>①</sup>而现代社会面临着“对西方遗产的逐步侵蚀与毁灭”的危机。<sup>②</sup>为解决这种现代危机带来的种种问题,不能仅依靠现代手段,还需重温古代。面临20世纪初期的时代大变局,齐默恩也将目光回溯至古代。在他看来,战争的起因、国际合作的方法等从属于国际政治领域的问题均能在古典时代找到相似物。故齐默恩开出的“药方”或与同时代其他理论家有所区别,也彰显其独特的理论价值。

齐默恩并非刻意地将古代与现代的事例加以一一对照,而是隐晦地体现在他的历史书写中。齐默恩在撰写古希腊历史时,倾向于将政治、经济、法律等结构性因素囊括其中,构成一种古今贯通的总体视角。这种历史书写并不以单纯的考据为目的,也跨越了“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等知识的界限,在《希腊共和国》发行的时代并不算常见。因此,此书一经问世便在当时的英国古典学界引起了不小轰动。有一些评论家就对此表示不满,称《希腊共和国》中的叙事过于“现代”。<sup>③</sup>例如,从此书这一书名中就能看出:在同时期的英国学界,极少有古典学者在介绍古希腊时使用“共和国”(commonwealth)这一

---

① 洪涛:《〈格列佛游记〉与古今政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3页。

② [美]列奥·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施特劳斯思想入门》,郭振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314页。

③ Paul Millett, "Alfred Zimmern's *The Greek Commonwealth Revisited*," pp. 181-182.

诞生于近代的英语词汇。<sup>①</sup> 齐默恩的历史写作手法类似于在其后的年鉴学派，即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所说的“唯一真正的历史就是总体的历史”，<sup>②</sup>因此，这在齐默恩所处的年代是十分具有开创性的，不过，他本人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创举：“从大范围进行思考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专利；从敞视的系统(spacious systems)进行研究也没有任何独特的优点”，这种“总体史观”早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就可以找到。<sup>③</sup> 这一思维方式使得齐默恩在涉足国际政治后更加关注事物之间的联系性，而不是仅从因果逻辑性(如政治理论家)，或历史客观性(如卡尔等历史学家)出发来思考国际事务。

在这种认识论的指导下，齐默恩经常通过描绘古希腊政治、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来凸显古代胜过当代之处。<sup>④</sup> 从中能大致概括出齐默恩的政治价值取向：一方面对于追求个人利益的反感，另一方面则是对献身公共生活的赞美。例如，在他本人翻译自希腊语的《国殇演说辞》中，<sup>⑤</sup>经他“加工”过的伯利克里讲到，雅典人“在全人类中独一无二，我们予人义事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是来自对自由的无畏信仰”，<sup>⑥</sup>所以，雅典阵亡将士“将自己献身共同体”。<sup>⑦</sup> 在这里，齐默恩使用了两个颇为现代的词汇：“个人利益”与“共同体”，并且在价值上把两者置于了坐标系的两端，表现了他对前者的拒斥和对后者的讴歌。此举并不仅是齐默恩在抒发个人感慨，而是包含了政治目的：他希望通过弥合个人与公共的矛盾，每个公民最终都能够投身于共同体的建设当中。那么，何谓“共同体”？在齐默恩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早期政治思想中，“共同体”是一种理想的政体形式，其中的每个公民通过遵循人的理性，形成一种共同遵守的普遍性的法则，通过这种法则积极投身公共生活、维护和扩大公共利益。在共

---

① Jeanne Morefield, “Alfred Zimmern’s ‘Oxford Paradox’: Displacement and Athenian Nostalgia,” in Morefield, ed., *Empires without Imperialism: Anglo-American Decline and the Politics of Deflection*, p. 47.

②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

③ Alfred Zimmer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20 February 1931*, Clarendon Press, 1931, p. 13.

④ Paul Millett, “Alfred Zimmern’s The Greek Commonwealth Revisited,” p. 182.

⑤ 齐默恩的译文译自其师维拉莫维兹(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的《希腊读本》(*Greek Reader*)，且该版本是齐默恩按照个人喜好而有意选择的。See Alfred Zimmern, *The Greek Commonwealth: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 p. 195 (endnote 1).

⑥ Ibid., p. 200.

⑦ Ibid., p. 202. “commonwealth”一词在希腊原文中为“koine”，意为“common”，见[日]马路智仁：《“因此他们献身共同体”：阿尔弗雷德·齐默恩的〈希腊共和国〉和帝国共和主义》，第398页。

同体的创建过程中,理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齐默恩写到,尽管雅典人“享有一切自由,但服从依旧是他的存在法则。他认可的那个主宰者……是宪法的法则……他自愿遵从这些戒律,因为它们体现了人的理性,并拒斥了人的任性。”<sup>①</sup>可以看出,“人的理性”和“人的任性”也构成了一对互斥的二分法。齐默恩对理性的看法接近于他多次引用过的亚里士多德,即拥有理性是人的特性:虽然人的灵魂中也有非理性的存在,但理性才是使人和其他生物区别开来的标志。<sup>②</sup>所以,理性源于人的独一无二的自主选择;与此相对,“人的任性”则是一种生物性的、任意的欲望。基于理性精神,政治行为体中的每个成员都认可并遵循一种普遍性法则(如他提到的“宪法的法则”),从而投身公共生活。齐默恩援引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描述,称雅典人“抛弃令人愉悦的日常生活,全心全意为共同体服务”,他们的“身体……是给城邦服务的,他们的头脑只有在为城邦所使用时才真正发挥了作用。”<sup>③</sup>可见,这种由古希腊类比而来的共同体观念,更多偏向一种国内政治的影射:“共同体”是对近代以来的“国家”这一政体的改进,齐默恩试图借此推行一种针对英联邦内部的改革。<sup>④</sup>

对公共精神的赞美和对私利的拒斥体现了齐默恩对西方近代以来以个体主义伦理道德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观念的扬弃。自19世纪起,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的自由主义越来越无法解决英国的国内和在海外面临的诸多问题,如国内社会差距加大,对外战争、殖民及海外扩张过程中产生的公共问题。在齐默恩之前,19世纪中后期,托马斯·希尔·格林为这种调和个人与公共的矛盾,试图对传统自由主义中的个体主义伦理观进行改进。格林指出,个人道德中的善良只有在社会中才可以实现。正统自由主义因过于强调个人自由的作用,导致其信奉者不管在政治、哲学抑或是经济学中都带有一种普遍无视道德

---

① Alfred Zimmern, *The Greek Commonwealth: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 pp. 125-126.

② [美]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詹姆斯·菲泽:《西方哲学史(第9版)》,邓晓芒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89页。

③ Alfred Zimmern, *The Greek Commonwealth: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 p. 77.

④ [日]马路智仁:《“因此他们献身共同体”:阿尔弗雷德·齐默恩的〈希腊共和国〉和帝国共和主义》,第397页。

的风气,最典型的是提出自由放任主张。<sup>①</sup> 相比之下,格林则认为,自由源于“解放所有人的能力,使它们能够平等地促进社会的共同利益”。<sup>②</sup> 格林的思想开创了名为“牛津学派”(Oxford School)的智识传统,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牛津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齐默恩。在齐默恩于牛津求学、任教期间,他积极参与了以格林思想为导向的校园团体,如工人教育协会(Worker's Education Association)、牛津亚里士多德学会(Oxford Aristotelian Society)等。<sup>③</sup> 通过对格林思想的吸收,齐默恩的政治主张中也体现出对纯粹追求个人利益的反对。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商业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的怀疑和反感,认为这种对私利的追求“并不必然预示着善念,从事商旅之人也不一定代表着启蒙和相互理解”,<sup>④</sup> 甚至称那些觉得国际主义能够持久扎根于商业领域(即贸易和平论)观点是“庸俗时代的哲学”。<sup>⑤</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打断了齐默恩的政治设想。一个基于理性和献身精神的共同体还未实现,人们的眼光就转向了如何结束战争及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然而,此时的齐默恩并未抛弃共同体观念,而是将对共同体的探讨转向国际层面,进一步延续和发扬了这种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齐默恩开始涉足国际政治领域。他在论述国际事务的著作中反复提及“共同体”(The Commonwealth,齐默恩也称之为 *res publica*)。此时,这种共同体不再是一种国家层面的政体,而是包括所有社会活动在内的、关系到每个个体的“公共事务”。<sup>⑥</sup> 这构成了他理解国际合作、国际教育等实践的出发点:每个国际公民都是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应培育他们的共同理想,使他们基于这样的一种思想来参与国际层面的公共生活、进行国际合作,从而弥补传统

---

① Jeanne Morefield, *Covenants Without Swords: Idealist Liberalism and the Spirit of Empire*, p. 30.

② Richard Nettleship, ed., *The Works of Thomas Hill Green*. Vol.3. Longmans, Green, 1888, p. 371.

③ Jeanne Morefield, *Covenants Without Swords: Idealist Liberalism and the Spirit of Empire*, pp. 24, 56, 60.

④ Alfred Zimmern,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Goodwill," in Alfred Zimmern, ed., *The Prospects of Democracy*, Chatto & Windus, 1929, p. 60.

⑤ Alfred Zimmer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20 February 1931*, p. 21.

⑥ Alfred Zimmern, *Nationality & Government with Other War-time Essays*, Robert M. McBride & Company, 1918, p. 136.

自由主义模式的一些缺陷(即认为经济相互依赖的增长能自发地带来和平等);并借此传播相互理解的理念,使得欧洲各国将会效仿英联邦形成一个共同体,并认为诉诸战争是不可想象的。<sup>①</sup>

纵观齐默恩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学术经历和思想转变,可以看出其古典学写作的目的不但是对历史的考据,而且希望从古代挖掘具有普遍性的、可供现代汲取的养分。<sup>②</sup>借古喻今、以古典的方式改革现代政治,这不仅是齐默恩也是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付诸的方式,譬如,格林的新自由主义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古希腊政治学说的影响。<sup>③</sup>同格林等人一道,古希腊传统很大程度地体现在了齐默恩的国际政治思想和实践中,成为了修正传统自由主义的理论工具;进而,作为世界上第一任国际政治讲席教授、《国际联盟盟约》的起草者之一,齐默恩也试图借自己的政治身份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

#### 四、当“共同体”遭遇“文明等级”

直至20世纪20-30年代,齐默恩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变动都有敏锐的察觉。他提出的所谓“理想主义”的政策主张并非因为没有意识到国际关系中权力政治的巨大影响力。<sup>④</sup>相反,恰恰是因为意识到权力政治的深刻影响,他才“刻意在我们这个时代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上持乐观态度”,因为若不进行国际合作,欧洲的文明将会毁于一旦。<sup>⑤</sup>齐默恩在其国际政治著作中对于古典学的引用和借鉴也揭示了这一点。

何谓“文明”?这是西方学者自古以来都争论不休的主题。亨廷顿曾提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西方国家所说的“文明”,究竟涵盖的是西方自现代化以来取得的优越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性成就,还是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

---

① Paul Rich, "Alfred Zimmern's Cautious Idealism: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Commonwealth," p. 86.

② Paul Millett, "Alfred Zimmern's The Greek Commonwealth Revisited," p. 178.

③ 邓振军:《共同善中的自由:托马斯·希尔·格林自由民主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7年5月,第4—8页。

④ See Paul Rich, "Alfred Zimmern's Cautious Idealism: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Commonwealth," p. 82.

⑤ Alfred Zimmern, *The Third British Empire: Being a Course of Lectures Deliver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Thi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first published in 1926), pp. 60-61.

古典文明的遗产?<sup>①</sup> 对齐默恩来说,答案显然是后者。如前文所述,齐默恩认为“文明”是对于公共事务的献身。这种品德并非每个国家和其人民都具有的,尤其是那些“认为经济相互依赖的增长能自发地带来和平”的国家或人士,他们都会破坏欧洲引以为傲的文明——正是这些文明让欧洲人拥有了崇高的道德,但对物质主义、商业精神的过度蔓延则会将这种德性损失殆尽。<sup>②</sup> 这种观念也被他类比到当今的国际关系中,即在国际层面支持一个由国际公民意识而非经济相互依赖所塑造“共同体”。齐默恩认为,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中,国家间仍缺乏共识,而共识恰恰是构建共同体的前提。1931年2月,齐默恩赴牛津大学在就任国际关系学讲席教授的演讲中,他援引希罗多德的论述,称希腊文明面对波斯侵略者时之所以具备政治团结,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血液、语言、宗教仪式和风俗习惯”;但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这种纽带是缺乏的,眼下国际关系的现状是一个日益充满多样性却缺乏共同精神的“初级的社会体系”:古希腊的那些“共同体的要素没有一个被所谓的‘国际大家庭’……的成员所共享”,因此,在所有国家“还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甚至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来构建这个目标之前就把他们召进(国联的)理事会中是违背理智的,是在招致灾难。”<sup>③</sup>至于为何在国际关系中缺乏共识,齐默恩指出,国际体系中存在“小国与大国,文明的国家与未开化的国家,受人尊敬的国家与名声扫地的国家”,<sup>④</sup>即不同国家实则并非平等或同质的主权国家,因此共识难以形成。这非但不“理想主义”,反而体现出了一种等级制色彩,且划分等级标准不仅包括国家实力,还包括“文明”和“声誉”这些重要依据。此外,作为国联的设计者和改革者,他还试图将这种观念内化到国联的框架之中。这种等级制观念仍可从他的古今类比中找到端倪。

首先,国际体系中的最高等级为何?在齐默恩的表述中,显然当属那些“大国”“文明的国家”和“受人尊敬的国家”,满足这些条件的方能在国际关系

---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8—61页。

② [日]马路智仁:《“因此他们献身共同体”:阿尔弗雷德·齐默恩的〈希腊共和国〉和帝国共和主义》,第405—406页。

③ Alfred Zimmer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20 February 1931*, pp. 17-19.

④ Alfred Zimmern,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Rule of Law, 1918-1935*, Macmillan, 1936, p. 165.

中获得“领导地位”。从古典学视角来看,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学说就认为基于共同理性形成的城邦与一个良善的统治者并不相悖。他并不排斥由一个德行在各方面都超过他人的人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进行统治,即他所指的君主政体。<sup>①</sup>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赞许,不难发现,在《希腊共和国》中,齐默恩所描述的古希腊田园牧歌的美好生活均以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为模板。此时的雅典正处于鼎盛时期,以优越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文明水平吸引着各地人民,是当之无愧的领导者。而回到齐默恩所处的年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当属拥有大国的实力、优越的文明和宪法制度的大不列颠。在20世纪,大英帝国已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世界霸权国,拥有强大的海军和众多海上殖民地,囊括了世界上近1/4的人口。<sup>②</sup>齐默恩实则暗示英国应如雅典一般拥有全球性的领导地位:相较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英国已是“一个包含五大洲人民的多民族联合体”(指英国本土和其自治领、殖民地),已或多或少存在“共同体”的要素(且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即统合其内部所有成员的领导力和凝聚力,使其拥有共同目标、认可共同利益。英国“虽不完美,但仍具备国联所没有的宪法机制”,她的“使命是维护世界和平”,是“当今世界抵御战争的最可靠的堡垒”。<sup>③</sup>因此,齐默恩相信,英国有能力成为普世价值的传播者,并呼吁将英国的政治体制应用到国联中,或至少英国在国联中应具有重要地位。<sup>④</sup>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变化的加剧,齐默恩愈发意识到国联正遭遇瓶颈,英国在国联中也并未起到他想象中的领导作用。1931年9月,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让齐默恩意识到,国联的规章实则无益于解决国家间争端,这使他备受打击。<sup>⑤</sup>因此,他期望对国联的组织架构进行及时调整,并于1936年出版《国联与法治》一书。在该书中,他认为,有必要像国内政治那样,在国际关系中也建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3、157页。

② Stella Ghervas, *Conquering Peace: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European Un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182.

③ Alfred Zimmern, *The Third British Empire*, p. 95.

④ See Tomohito Baji, *The International Thought of Alfred Zimmern: Classicism, Zionism and the Shadow of Commonwealth*, Ch. 1.

⑤ Paul Rich, “Alfred Zimmern’s Cautious Idealism: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Commonwealth,” p. 85. 此处,里奇并没有提及齐默恩对日本的微妙好感。早在《希腊共和国》中,齐默恩就言及日本人具有崇高的道德感和集体主义精神,使其有别于其他国家,并更有助于建成他心目中的共同体。Alfred Zimmern, *The Greek Commonwealth: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 p. 77 (footnote 1). 因此,即便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退出国联,齐默恩仍支持日本作为大国行列参与国际事务。

立法治(the rule of law),<sup>①</sup>这种法治既源于前段提及的“宪法机制”,即一种国内制度在国际层面的应用,也与上文提到的古希腊精神凝结成的理性法则相联系。因此,齐默恩此刻仍期望国家间达成共识,但他将这一范围进一步缩小至部分国家。国联在创立之初本包含四个常任理事国(英、法、意、日)及四个非常任理事国(比利时、巴西、希腊、西班牙)。1933年,在德国和日本退出国联后,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升至11个。齐默恩建议进一步改革这种机制,组建一个由7个大国(包括英、法、意、日、美,以及有条件地加入德、俄)组成的常设委员会,作为所有成员国的代表,每年举行会议并交换意见;其他签署国的外交大臣应以较短间隔时间举行会议(如每四或五年)。他还期望,上述安排也将诱导着“次等强国”(smaller Powers)(如斯堪的纳维亚和西方的斯拉夫国家)模仿大国成立政治联盟,继而成为一流国家的候选人。<sup>②</sup>

这种大国对次等强国的引领更为直接地揭示齐默恩思想中存在着等级制观念。那么,次等强国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何种定位?这也可从《希腊共和国》中找到影子——齐默恩在书中也多次涉及雅典帝国的“文明”和其对非雅典公民的“引领”。这些论述部分集中于对雅典城邦中的常住外邦人(metic)的描述中。毫无争议,古希腊的常住外邦人与奴隶、女性和未成年人一样,都不属于某一城邦中的正式公民,不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然而,齐默恩却将常住外邦人称为“帝国内的自由伙伴”(free partners in the Empire),<sup>③</sup>他们来到雅典和雅典接受他们大多是出于经济原因,即与雅典人进行手工艺品贸易。齐默恩援引古希腊史学家狄奥多罗斯的表述:“说服(雅典的)人们准许常住外邦人和工匠免受特殊税负,这样许多人就会从世界各地来到(雅典)城邦,他们就能轻松地创造更多的手工艺品。”<sup>④</sup>然而,经济并不是吸引常住外邦人的唯一因素,齐默恩还提到常住外邦人的公民权利和身份问题,进而写到他们“被吸引到‘雅典学派’不仅仅是因为她的‘门户开放’政策,而且是因为他们钦慕她的理想并且在她的体制里迫不及待地谋求合作。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不是蛮族人而是希腊人,都对雅典的卓尔不群欣赏之至,并且像皈依者时刻准备着般

① “Preface,” in Alfred Zimmern,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Rule of Law, 1918-1935*, p. vii.

② Ibid., p. 203.

③ Alfred Zimmern, *The Greek Commonwealth: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 p. 389.

④ Ibid., p. 374.

随时会成为雅典最为热诚的拥护者和宣传者。”<sup>①</sup>可见,在齐默恩眼中的常住外邦人对于雅典城邦不只具有经济合作的属性,他更想强调几点:他们受到雅典文明的感召,进而自愿与其进行合作;加之,并不是随便哪个外邦人都受到雅典帝国的欢迎——他们不仅要是那些在手工艺上值得称道的人,还要是“希腊人”,或至少不能是“蛮族人”。满足这些条件,雅典才会以东道主的身份欢迎他们。虽然这些人尚未享有完全的公民身份,齐默恩事实上暗示他们理应拥有,并把其视作雅典帝国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需要解释的倒是为什么他们会由于宗教或不怀好意的嫉妒等原因被排斥在完全的公民身份之外”。<sup>②</sup>

通过上述对常住外邦人之于雅典人描述,不难看出次等强国之于西方世界的地位。从西方列强(或者说从大英帝国)的视角出发,斯堪的纳维亚和西方斯拉夫国家既具备一定物质条件,也在文化和制度上从属于西方世界,因此应在大国的引领下走向文明。然而,就目前的国际局势来看,齐默恩并不试图让其与列强平起平坐,而是先让其接受大国的“引领”。这种观点也为他招来了一些左翼人士的批评,例如,英国工党领袖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便与齐默恩针锋相对。在由伍尔夫本人创办的《政治学研究》季刊中,他撰写了对《国联与法治》的书评,公然抨击齐默恩把自由平等法则应用到国际层面的所谓“共同体”主张太过不切实际,还指责他关于国联和国际秩序的设想中混入了以大国为主导的权力政治的因素。<sup>③</sup>

不过,次等强国至少还有与大国平起平坐的可能性;在等级制的底层,仍有诸多“未开化的国家”,它们比次等强国需要更多的引领和教化,齐默恩也未将他们纳入自己对国联常设委员会的构想。与此相应,在齐默恩看来,雅典“帝国内的自由伙伴”除常住外邦人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奴隶。从史实上看,奴隶比常住外邦人更甚,完全不具备公民权利。因此,将国际体系中“未开化的国家”类比亚古希腊城邦体系中的奴隶或许有些耸人听闻。但不同于当时乃至现在的主流古典学研究,齐默恩并没有把奴隶制视作一种落

---

① Alfred Zimmern, *The Greek Commonwealth: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 p. 377.

② Ibid.

③ Leonard Woolf, “Review Article, Untitled,” *Political Quarterly*, Vol.7, 1936, pp. 290-291.

后野蛮的生产关系或对人类同胞的摧残，反而积极地认为奴隶是一批准备向正式公民迈进的“预备役”。齐默恩指出，与现代奴隶（如热带种植园奴隶）不同，古希腊并没有将买卖和使用奴隶视作是一种犯罪或违背道德的行为。<sup>①</sup> 原因在于两者的劳动动机：现代奴隶劳动仅仅是出于恐惧，且身体遭受强迫；而古希腊奴隶并没有受到非人的待遇，反而通过一段时期的劳动后他们有可能会获得自由，即获得与常住外邦人一样的公民权利。并且，雇主也会训练和说服自己的奴隶（而不是强迫）进行劳动，使其“不仅被教会如何工作，还要被教导如何培养对工作的兴趣”，并且“乐于劳动”，感到自己的劳动富有意义，最终“重燃心中微弱的希望和自尊”。因此，齐默恩将古希腊奴隶称为“为了自由的学徒工”。<sup>②</sup> 在1922年出版的古典学论文集中（彼时他已涉足国际政治领域，不再从事古代史的教学），齐默恩重申了相同的观点，他援引亚里士多德的和色诺芬的叙述来佐证其“奴隶劳动的动机是为了获得自由”的主张，并将其命名为“学徒奴隶制”（apprentice-slavery）。<sup>③</sup> 这些奴隶“几乎在平等的条件下，共同帮助他们的主人，为他们今后将共同享有的文明创造物质基础”。<sup>④</sup> 比起外邦人，古希腊奴隶不仅没有享有公民身份，而且缺乏享有公民身份的条件，他们仍需向主人“学习”，而主人也需要“培养”他们，燃起他们对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向往。

齐默恩看待古希腊奴隶制的观点是修正性乃至颠覆性的。那么，回到当时的国际体系中，他是否也用这种观点看待“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呢？对于20世纪初的英国政府来说，除大英帝国、次等强国外，印度等由英国公职人员直接进行管理的殖民地政府也可以被视作国际体系中的成员——前提是它们必须接受英国的管辖，并效忠英国皇室。这种通过效忠而塑造起来的政治等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的。也就是说，在英国眼中，殖民地的地位也会随着其“文明”水准的提升而提升。<sup>⑤</sup> 在齐默恩从政期间，他并未直接插手过殖民地管理的工作。较之同时期其他专业人士，他对殖

---

① Alfred Zimmern, *The Greek Commonwealth: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 pp. 380-382.

② Ibid., pp. 384-385.

③ Alfred Zimmern, *Solon & Croesus: And Other Greek Essay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p. 121-123. 尽管齐默恩在此也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论述和他在其他场合关于奴隶制的论述存在冲突。

④ Ibid., p. 162.

⑤ Stella Ghervas, *Conquering Peace: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European Union*, pp. 182-183.

民地政策的系统论述则是较少的。不过他曾提及,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及英联邦的各个自治领都应为了帝国的共同利益献身,通过这种共同联系的建立来构筑一个“更伟大的不列颠”。<sup>①</sup>此外,他还高度评价了英国曾经在印度殖民地建立的文官制度,认为历史上没有其他公共行政制度能与其相比:“事实上,英国绅士对那些人民(指印度人)来说一直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启蒙教师。”<sup>②</sup>这种观点恰好和同时期的英国政客相吻合:他们同样喜爱打着“自由”的旗号对殖民地进行特殊关照,认为战后欧洲国家应帮助殖民地建立政治和社会体系,最终帮助他们在“现代世界的艰苦条件下”成为“自由人”。<sup>③</sup>显而易见,这其中饱含欧洲人对于殖民地的“文明标准”。

## 结 语

本文从古今类比的认识论层面阐述了齐默恩的“共同体”观念的形成过程,并揭示其如何与文明标准相结合,构成一种国际等级制观念。与其说这是“理想主义”,毋宁说更偏向于保守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说,齐默恩的国际政治思想并未与当时的政治大众化潮流向顺应——进入20世纪,新的权力中心异军突起,国家、个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社会团体……新兴政治行为体不断登上国际舞台,国际社会中再难找到一个恒定的权威以提供稳定的世界秩序,大国协调的有效性不断遭到质疑,以某一国家为模板构建一个“共同体”也显得尤为不可能。正如沃格林对于宗教改革的评价:在这场大混乱中,各种特殊化的力量纷纷崛起,打破了基督教欧洲从前的普遍精神秩序。每一种力量都要求精神和政治上的统治权,但它们未能建立起一个新的普遍秩序,反而造成了巨大的分裂和无序——这便是现代性的开端。<sup>④</sup>由此观之,齐默恩的观念无异于对这一现代性问题给出一个“前现代”的解决办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齐默恩的思想在当代失去了研究意义和理论价值。齐默恩固然受到所处国家、年代和环境等因素的特殊影响,其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具有偶然性且难以

---

① Alfred Zimmern, *The Third British Empire*, p. 97.

② Ibid., p. 103.

③ Leonard Woolf, *Economic Imperialism*, Swarthmore Press, 1920, p. 111.

④ [美]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五: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霍伟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2页。

复制,但时过境迁,人们仍能够在后世的国际政治实践和理论中看到齐默恩思想的影子,这些超越历史语境的部分才是其思想的闪光之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之对欧洲政局的失望,使齐默恩最终于1947年移居美国。但直至逝世前夕,他仍继续活跃在国际合作的舞台。<sup>①</sup> 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鉴于齐默恩在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等平台任职并在国际教育方面卓有成就,他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围绕该组织的建立,齐默恩和其他相关人员曾产生激烈争论:是否应将当时新兴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也纳入到联合国的职权范围之内? 在此,齐默恩仍重申古典学传统、文化和道德等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并对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持怀疑态度。<sup>②</sup> 这并非保守的固执己见,而是根植于他对更宏观的时代背景的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等科学家在美国“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的支持下发明了原子弹这一新型战争武器。1945年,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掷原子弹。此举虽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进程,但也轰动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究竟是会对人类社会带来福祉,还是会带来更大规模、更不可逆、更反人道主义的破坏? 随着冷战的爆发,国际格局更陷入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致使全世界公众沉浸在“核恐怖”的氛围之中。在这一背景下,齐默恩对科学技术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进一步产生了警惕和反思。他认为科学并不天然地对道德负责。<sup>③</sup> 从技术中立的角度来看,科技自身并非具备促进或削弱全人类合作的功能,因此,以科学作为国际知识合作的纽带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只有各国“有益地使用权力”,它才能够变成国际社会的纽带。为此,齐默恩仍提倡各国应谨慎地依照国际条约行事——正如《国联与法治》中所提到的“法的统治”,而非把国际安全的希望寄托于外交手段。<sup>④</sup>

冷战可谓印证了齐默恩关于科技、合作和安全的主张: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核威慑等外交政策险些将世界再次拖入新的大战;而随着《不扩散核武器

---

<sup>①</sup> Paul Rich, “Alfred Zimmern’s Cautious Idealism: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Commonwealth,” p. 92.

<sup>②</sup> Toye and Toye, “One World, Two Cultures? Alfred Zimmern, Julian Huxley an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UNESCO,” pp. 309, 325.

<sup>③</sup> Ibid., p. 317.

<sup>④</sup> Paul Rich, “Alfred Zimmern’s Cautious Idealism: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Commonwealth,” pp. 92-93.

条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的签署,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关系才逐步走向可控,其他国家的安全才得以确保。正如里奇所言,相比其他年代,齐默恩的思想在冷战结束后的当代能获得更多的共鸣——他曾强调以法治和条约的力量来约束国际社会、以“责任政治”来克服“权力政治”。<sup>①</sup> 这些主张在经历了“核冬天”和剧烈体系变动的20世纪90年代显得愈发具有现实光辉。

除实践意义外,齐默恩的影响也不断体现在后世的理论建构中。不难看出,“共同体”(Commonwealth)这一词汇的现代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就脱胎于“英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即英国本土的政治制度和实践;同时,这种排斥私人利益、提倡公共利益、强调国际法治的“共同体”观念和塑造这种观念的哲学、帝国背景也深刻地影响了英国学派的理论谱系。齐默恩曾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sup>②</sup>并在此期间发表过一些广泛影响的文章。<sup>③</sup>该机构的职能就是为调整国际关系和实现英联邦的“帝国善治”提供智力支持。彼时,伦敦经济学院(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英国学派的奠基人查尔斯·曼宁(Charles Manning)就曾受到该研究所的鼓舞,对其中关于“共同体”的思想主张尤为感兴趣,并将其设想为一股促进全球福祉的新兴力量,<sup>④</sup>和齐默恩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期提出的共同体观念“福利国家”概念一脉相承。<sup>⑤</sup>在1962年退休之际,曼宁出版了《国际社会的本质》一书,强调国际法和国际道德在国际社会中的约束作用,成为国际社会理论的奠基之作;<sup>⑥</sup>同一时期,曼宁的观念也由其学生马丁·怀特,以及受到怀特巨大影响的赫德利·布尔发扬光大。在怀特看来,国际理论应是关于国际社会、国际大家庭或国际共同体的一种思考传统。<sup>⑦</sup>布尔则进一步系统阐述了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反复强调

① Paul Rich, "Alfred Zimmern's Cautious Idealism: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Commonwealth," pp. 93-95.

②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因其所在建筑名称亦被称为“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该机构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创立于1920年。创设该机构的主张即由齐默恩的好友、“圆桌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柯蒂斯(Lionel Curtis)提出。

③ Paul Millett, "Alfred Zimmern's The Greek Commonwealth Revisited," p. 170; Baji, *The International Thought of Alfred Zimmern: Classicism, Zionism and the Shadow of Commonwealth*, p. 132.

④ See Robbie Shilliam, *Decolonizing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John Wiley & Sons, 2021, Ch. 5.

⑤ 齐默恩是最早提出“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概念的学者,参见 David Edgerton, *Warfare State: Britain, 1920-19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59.

⑥ Peter Wilson, "Manning's Quasi-masterpiece: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Revisited," *The Round Table*, Vol.93, No.377, 2004.

⑦ 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 No.1, 1960, p. 36.

其形成基于国家间的共同规则、价值、利益等因素。<sup>①</sup>此外，布尔于1959年发表的另外一篇重要文章《何为共同体？》也可以被视作对齐默恩思想的间接传承。布尔在文中写道：“共同体”作为一种国家联合的形式，尽管深为英国人所熟知，但却很少受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关注；其核心是同时确保国家的联合状态以及内部多个国家的自由。<sup>②</sup>这种理念虽和英国本土政治制度及殖民行径密切相关，却被布尔视作一种迥异于当前国际实践的国家联合方式进而加以论述。可见，从齐默恩到布尔，“共同体”思想中的核心要素仍被不断提及，构成了英国学派的理论基石之一，也折射出英国对于往昔帝国实践、文明标准的怀恋。现如今，英国学派内部也开始了反思帝国思想的潮流，例如，江文汉(Gerrit W. Gong)就曾撰写过《国际社会中的“文明”标准》一书，剖析欧洲如何将“文明”这一标准强行融入国际社会的扩展过程。<sup>③</sup>总之，研究齐默恩的国际政治思想对回顾学科史和理论史、剖析其中隐含的思想观念是十分必要的。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所言，只有国际政治思想史研究才能够让我们跳出各种预设立场，“帮助我们塑造且充实我们对于共同体、权力和主权的理解”，让人们以史为鉴、更好地看清现在的自者和他者。<sup>④</sup>

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学科诞生虽已过去百年，但当下的政治现实仍鞭策着今人不断反思过去——恰似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说，“一些最新的争论常常能够刺激历史学家就过去提出新的问题。”<sup>⑤</sup>在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学转向中，中国学界也逐步对史学路径(如思想史、历史社会学等)予以重视。<sup>⑥</sup>时至今日，学科中仍有诸多历史误读亟待破除。为避免理论建构中的时空错置，必须尊重历史、回归历史。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就曾提出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学派存在历史与理论脱节

---

①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第四版）》，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一章。

② Hedley Bull, “What Is the Commonwealth?” *World Politics*, Vol.11, No.4, 1959, p. 577.

③ Gerrit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larendon Press, 1984, p. vi.

④ [美]大卫·阿米蒂奇：《内战：观念中的历史》，邬娟、伍璇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12页。

⑤ [英]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学》，陈志宏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⑥ 刘德斌：《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史学集刊》2020年第4期；杨光斌：《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7期；张飏：《西方国际思想史研究的新发展》，《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5期。

的问题,并将其形象地称为“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sup>①</sup> 这突出体现了学科内部目前仍以西方视角为主,并未真正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纳入理论构建中,导致一旦言及“国际关系”,学者仍首先想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非春秋战国、黑船来航等。但自冷战结束后至今,随着更多国家的学者活跃在学术舞台,学界已开始对上述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进行反思和修正。例如,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与布赞2019年出版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作为其中的代表作,已在我国学界已产生较大影响;<sup>②</sup>2022年,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创办的《国际事务》也迎来百年纪念,刊载了以种族与帝国主义的历史与实践为主题的纪念专栏。<sup>③</sup> 正如葛兆光所言:思想史需呈现不同文化、民族和国家的生活环境。<sup>④</sup> 基于这种多样性,解读西方的国际政治思想史才可以为阐释中国的国际政治思想、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提供经验上和方法论上的支持。同时,世界的国际政治思想史研究也呼唤着中国学者发声。这两者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为此,中国学术界也需要一种更为开放、包容和多元化的学术环境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

---

①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Wh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Failed as an Intellectual Project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 No.1, 2001.

②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刘德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③ Jasmine K. Gani and Jenna Marshall, "Race and Imperi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8, No.1, 2022.

④ 葛兆光:《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文史哲》2011年第2期,第45—46页。